

法藏敦煌藏文寫卷 P.T.980 考釋

釋理揚

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碩士

法藏敦煌藏文文獻 P.T.980 號為貝葉書式寫本，保存非常良好，沒有破損及蟲噬的現象；紙材為麻紙，紙張顏色為淺赭色，紙張稍厚，背面文字沒有透出來；正、反 5 葉共 10 面，每葉正面依次有 ka、kha、ga、nga、ca 的藏文葉碼，大小為 42×8.8cm；木筆書寫，沒有格線，開頭的一句長行為紅墨汁書寫之外，隨後的 118 個偈頌為黑墨汁的藏文楷書 (dbu can) 和草書 (dbu med) 的混合字體；字體工整、秀麗，偶有塗改、插補文字的現象，寫卷字跡十分清晰，極易辨識；首尾完整，沒有標題；除了 ka 葉 a 面為 8 行及 ca 葉 a 面為 10 行之外，其餘 8 個葉面均為 9 行，總共有 90 行文字。卷首藏文為 bcom ldan 'das kyis byang chub sems dpa' yul 'khor srung la bka' s'tsal pa// (意為：「世尊告護國菩薩言」)，卷末尾藏文為// rtag tu spyod pa thams cad bsgrub par bya // (意為：「常應修集一切行」，CBETA, T11, no.310, p.464, a19)。寫本上的書寫除了漏寫一個單垂符與多出三個音節點之外，整份文件所具有的完整性與幾乎無誤的書寫質量，十分有助於敦煌古藏文語文方面的研究。

P.T.980 寫卷最初於 1908 年隨著法國語言學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將大量稀有珍貴的敦煌藏文文獻帶回法國並為其國家圖書館藏之後，分別歷經了 1950 年馬賽爾·拉露 (Marcelle Lalou, 1890-1967)

、1992 年王堯與 2009 年《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三次正式的編目整理。而近年該寫卷的微縮圖版，已公開在「國際敦煌項目」(IDP) 網站與《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第九冊之中。在前二次的編目中，該卷經名仍未被確定；直到第三次的編目，才開始有擬定的藏、漢文對照的經名 byang chub sems dpa' yul 'khor skyong gis zhus pa'i mdo/《大寶積經·第十八護國菩薩所問經》。然擬名的依據為何，彼處未有說明。

目前 Rāṣṭrapālapariprcchā-Sūtra (簡稱 RP) 現存公認的藏、漢譯本有三種：六世紀中葉闍那崛多的漢譯本《大寶積經·第十八護國菩薩會》(簡稱 Ch1)、九世紀初葉 Jinamitra、Munivarma 與 Ye she sde 共同藏譯的

'phag pa yul 'khor skyong gis zhus pa shes bya pa theg pa chen po'i mdo/ (簡稱 Tib1) 以及十世紀中葉由施護漢譯的《佛說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簡稱 Ch2)。根據最近學者 Daniel Boucher 於 2008 年的 *Bodhisattvas of the Fore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hayan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Rastrapalapariprccha Sutra* 研究顯示：目前 RP 現存的藏、漢譯本的流傳形式上，內容及架構大多與闍那崛多譯本相近。而 P.T.980 (簡稱 Tib2)，亦不例外。

由於寫卷的擬名、內容篇幅與詞句結構上，都分別與 RP 的三種譯本各有不同的相近關係，從而在這些混亂不清的現象中帶來無法從一判斷上的困難。例如：在擬名方面，藏文的擬名與《西藏大藏經》中 Tib1 不同，漢文的擬名也與《大正新脩大藏經》中 Ch1 及其異名《護國菩薩經》都有些文字上的出入，很容易使人誤解為 P.T.980 原有題名及與 Ch2 有直接的關係，或聯想經名是根據其他相關寫卷的題記發現所擬出的；在篇幅方面，與 Tib1 之 bam po gnyis pa gleng gzhi'i le'u (《卷二緣起品》) 相當，而 Vaidya 刊本中 RP 的 nidānaparivartah (《緣起品》)，卻不似 Tib1 有二卷之別，所以 P.T.980 也有可能是參考 Tib1 或是與其相近的傳本而譯出的，以及當 P.T.980 與漢譯本的譯語皆不同，而與 Tib1 一致之時；在偈句的語詞及語句結構方面，P.T.980 都與 Ch1 十分相近，而漢譯的擬名與 Ch1 及其同經異名卻不同，但就句數、句意與譯語語詞非常一致的現象來說，P.T.980 很有可能是譯自 Ch1。因此，本論文的目的即在考證法藏敦煌藏文寫本 P.T.980 的翻譯底本是否直接譯自闍那崛多的漢譯本《大寶積經·護國菩薩會》而來。

論文分為四章，內容摘述如下：

一、第一章的緒論，說明以該寫卷為研究動機或目的，以及簡述當代學者對於 P.T.980 寫卷本身、內容及相關的翻譯底本之研究成果的概況，並且說明研究問題、方法與論文架構。

二、由於在本論文之前，尚未有學者對整體寫本做過研究，因此在第二章中分別以文獻記錄、寫卷特徵

與寫本原文轉寫三節來介紹寫卷的概貌。

(一) 文獻記錄方面：關於敦煌寫本物質上的描述，在拉露目錄與王堯目錄中都是以體例性的文字表達。由於描述過於精簡，寫本微片的物質狀況與記錄之間有些觀察上的落差，並且此二個版本的文字記錄也有些出入，其正確與否往往不易察覺出來；故以疏理這些文獻記錄，同時指陳其間的差異，藉此介紹 P.T.980 寫本的物質概況。

(二) 寫卷特徵方面：九世紀的藏文寫本，與我們現今所見的《西藏大藏經》藏文本極為不同，此中就書寫形式與古藏文語詞的現象，展現 P.T.980 寫卷在書寫方面的特徵：

1. 書寫形式：敦煌藏文寫卷的書寫形式各有千秋，沒有規範可循；敦煌古藏文與現今藏文書寫之間的差異，不都是拼法或抄寫所使然的錯誤，有些反而是敦煌古藏文當時的書寫特色。即以 P.T.980 寫卷的書寫形式為例，舉出其文字與符號方面的特色之處，往往也是容易被錯解為書寫錯誤的現象。在文字方面就有因混合字體、縮寫與字母互換而被錯解的實例；符號方面則為古藏文特殊符號的現象。

混合字體的文字現象：敦煌藏文的混合字體，一般常見的有以楷書為基字或行書作為基字的二種混合形式，與現今藏文所用的楷書與行書字體不同。而 P.T.980 的混合字體，則不屬於前二種形式，而是以字母中的 kha、ga、nya、pha、tha、zha、za、sa 及四個元音與下加字中的 ya 為楷書，而以字母中的 ka、nga、ca、cha、ja、ta、da、na、pa、ba、ma、tsa、tsha、dza、'a、ya、ra、la、sa 及上加字中的 ra、la、sa 與下加字中的 ra、la 為行書的書寫形式。此中可以看出 nga、cha、ta、da、pa、ba 字是較早發展成現代藏文草書的字母。這樣的現象，正好說明了藏文的有頭字和無頭字，並不是一開始就由圖彌·桑布札 (Thu mi sambhota) 所創造出來的，而是從書寫的習慣中漸進地發展出來的變形字體。

其次，縮寫的文字現象是為了速寫的方便而簡化了筆劃。字母互換的文字現象，只出現 ca↔cha 與 pa↔pha 二組不送氣音與送氣音的基字字母互換情形。而古藏文符號的書寫現象為常出現在敦煌藏文文獻之前的特殊符號。

2. 古藏文語詞的現象，例如：(1) 無規律性的元音 'i 的反寫；(2) 'i、'ang、'u 與 'o 常自成音節，與現今藏文文法的規範不同；(3) 後加字 'a 在單個基字或帶有元音的字後與動詞

加 pa 的句尾置入成為墊音；(4) 現代藏文中的否定詞 mi 與 med，在文字釐定前是 ma 字帶下加 ya 的拼寫形式——否定詞 myi 與 myed，這種形式於文字改革時即已取消，文字釐定後也常出現 ma 字帶下加 ya 的拼寫形式，而在該寫卷中有些 ma 字帶下加 ya 的現象，卻不限於否定詞 myi 與 myed 者。

可見，敦煌藏文寫本本身特有的書寫現象，使我們難以釐清文字之間的差異原因為何，即便是存於敦煌藏文與現代藏文之間的差異。就此寫卷的古藏文語詞的現象，也很難判斷文字正確與否，安世興在〈評介古藏文詞書《丁香帳》〉文中有提到釐定新語之前的藏文詞匯就有因書寫錯誤而被誤解為藏文古詞的現象，而這樣被誤解的古詞，在敦煌藏文寫本中並不因為文字改革而受到使用規範的影響；如有很多混用的現象，也都與現存的文字釐定史料有所抵觸。正因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發現，才使得學者對藏文文字改革的界線產生質疑而待商榷。

三、第三章為了探討 P.T.980 的翻譯底本是否直接譯自 Ch1，首先進行藏、漢譯本的偈句比對。然後，從偈句的語詞與語句的內容差異、偈句的前後句次的句序差異的分析結果中，論證 P.T.980 是否直接譯自 Ch1。

以 Tib2 為主，同時比對其他三種譯本的內容差異所得到的情況有五種：

(一) 當 Tib2 與 Ch2 不一致，而與 Ch1、Tib1 一致時，亦即顯示 Ch2 與 Ch1、Tib1、Tib2 都不一致。這樣的現象很多，共有 171 處，多為 Ch2 的增句與減句的現象，筆者無法判斷施護譯本究竟是因為傳譯底本的不同還是翻譯詮釋上的問題，而與其他譯本在語詞、語句方面出現很大的差異；儘管施護譯本常受到學者視為譯文拙劣的攻訐，但在本章 (三) Tib2 與 Ch2、Tib1 不一致，與 Ch1 一致的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到 Ch2 與 Tib1 的譯本也有些一致的情形與 Tib2 不同，也說明了 Ch2 與 Tib2 的差異，在此處不完全都是施護在翻譯詮釋上的問題。

(二) 當 Tib2 與 Tib1 不一致，與 Ch1、Ch2 一致時，也就是 Tib1 與 Tib2、Ch1、Ch2 都不一致。這樣的情形很少，只有 14 處，也多為增句的現象。

(三) 當 Tib2 與 Ch2、Tib1 不一致，與 Ch1 一致時，就表示 Tib2 的句型比較與 Ch1 一致，共有 184 處。這種情形比 Tib2 與 Ch1、Tib1 同時一致之處要多，並且多為詞意與句意上的一致，也顯示出 Tib2 與 Ch1 較之其他

譯本要更相近些。

(四) 當 Tib2 與 Ch1、Ch2 不一致，而與 Tib1 一致時，就表示 Tib2 較與 Tib1 一致，這樣的現象只有一處，並且顯示出 Tib2 有可能參考 Tib1 的詞意而修改譯出。

(五) 當 Tib2 與 Tib1、Ch1、Ch2 都不一致時的情形有三處，有二處顯示 Tib2 有被修改過詞句的跡象，另一處為增詞的現象。

而句序差異的分析結果顯示出：四譯本在增、減句的現象中，Tib2 與 Ch1 的偈句總數有 100 % 的一致之處；句次不一與併句的現象各有 15 及 5 處，較之其他譯本的現象都要來得少。

以上，Tib2 與 Ch1 不一致的地方，例如：語詞方面的詞意、增詞、減詞與改詞現象以及語句的句意、增句、減句及改句，較之其他三種譯本來說，情況甚少。這些都顯示出 Ch1 與 Tib2 在偈句的對應與文意方面，較之諸譯本的關係來說，都要來得密切些。此外句序不一致之處，Ch1 也比其他譯本的差異現象要來得少，而且於比對結果所出現不一致的地方，透過分析之後顯示出只是因為不同體系語言下的語法之語序不同所致，實際上並不算有比對上所出現的不一致的差異。

四、第四章結論：本文透過偈頌比對、歸納與分析，確定法藏敦煌藏文寫本 P.T.980 號的翻譯底本是直接譯自闍那崛多的漢譯《護國菩薩經》，並且有參考智軍藏譯本修改而成的現象。

研究過程中發現：在敦煌藏文寫本中所出現的印度文詞匯的譯語（藏語中稱為「新譯」），是相對於漢文詞匯（稱為「舊譯」）而來的；判斷的基準是以 814 年《翻譯名義大集》為主。通常梵文漢譯的藏譯本的翻譯底本研究，一般使用藏譯本的譯語與傳統藏譯譯語不同而與漢譯譯語的表達方式一致來推論是直接譯自漢譯本的方法。然此法不都能適用於敦煌藏譯本中，如 P.T.980 寫本的譯語與智軍藏譯本的翻譯，除了少數意譯與直譯的差別、語句的增減情形之外，譯語上大抵都沒有不一樣，而與漢譯的表達方式也沒有都一致的現象，所以不宜採用於譯語中出現漢文詞匯的現象來判斷是否譯自漢譯底本的問題。並且也應考慮敦煌藏文寫本使用

詞匯的情形，常有印度文詞匯、漢文詞匯與混合詞匯有二或三種同時存在於同本經文之現象，若以「譯自該本即理應出現該語言詞匯」的推定方法，這在敦煌藏文寫本中，恐多是無效的。1983 年法國藏學者石泰安 (Rolf Alfred Stein, 1911-1999) 在《敦煌寫本中的印——藏與漢——藏兩種辭匯》研究的案例中提到：同樣是于闐文古譯本與《西藏大藏經》中智軍藏譯本的《妙法蓮華經》，都具有同樣的印度文詞匯以及偶有使用漢文詞匯的情形。若將智軍藏譯本中有使用漢文詞匯的情形，做為推論其譯自漢文本的證據，這樣的推論結果將會帶來困窘，因為沒有史料可以證明智軍懂得漢語。同時，也說明藏文文字改革的厲行制度，在敦煌藏文文獻中顯然並未受到嚴謹的規範。

有關這份寫卷的譯者推論及此經的其他品數的發現、譯本的語言比較等後續研究，都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根據寫卷內容的篇幅——五十則佛本生故事與當時敦煌石窟中多以《賢愚經》的本生、因緣故事為題材的壁畫來猜測：P.T.980 的翻譯或抄寫可能與《賢愚經》的流傳有關，當時也有法成從漢文藏譯的《賢愚經》以及從梵文漢譯再藏譯的《大寶積經》第七、十三與第四十會；這些蛛絲馬跡或許可作為語言學上譯者考察的方向之一。最後，期許本文的研究，能利於 P.T.980 諸項後續研究工作的進行。

譯本與 Tib2 對應句差異現象統計表

項 目	Tib1		Ch1		Ch2	
	句 數	百 分 比	句 數	百 分 比	句 數	百 分 比
偈頌 句數	456	96.61 %	472	100 %	408	86.44 %
句序 不一	79	16.74 %	15	3.18 %	63	13.35 %
併句	22	4.66 %	5	1.06 %	17	3.6 %
增句	22	4.66 %	0	0 %	69	14.62 %
減句	36	7.63 %	0	0 %	126	26.7 %